

诗想越界：杜运燮的中心—边缘对话

[马来西亚]许文荣*

— 目录 —

来自马来山芭的诗人
马中两地培育的诗苗
西南联大的峥嵘岁月
缅甸印度从军西天缘
南洋执教谱热带风光
下放山西赴中原补课
重返北京憾夫人病逝
「秋」篇激起朦胧诗论争
九叶奠定诗坛一席位
实兆远是爱的第一个
落实两点创第二丰收
骨灰撒大海魂归故乡

来自马来山芭的诗人

林万菁与赵戎在谈到杜运燮时，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即把杜运燮视为中国南来作家。¹⁾这或许是杜运燮与中国的关系太深了吧，使到杜运燮拜读了林氏的著作后自己也要澄清说：“我原来的确是华侨。我出生在马来西亚霹靂州实兆远甘文阁附近山芭的一个亚答屋里”²⁾。若用今天的学术话语来定位，杜运燮

*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1) 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新加坡，万里书局，1978，第107-111页；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1）』，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8页

2) 杜运燮，「致xx先生」，『热带三友·朦胧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第265页

应被视为所谓的归侨作家。他出生在实兆远的乡下，在当地接受了小学与初中教育，16岁才到中国福州继续高中教育。在杜运燮在离开马来西亚霹靂州之前，已经打下了很好的文化根底，包括文学知识的基础。

杜运燮追忆童年与少年时期在实兆远接受教育的情况时说：“那小学（新民学校）是当地华侨在我入学那年创办的，……老师们无论从中国刚来不久，或来自新加坡、檳城等大城市，都很认真负责。他们不但在课堂上严格执教，让我们学好各种课本知识，而且还在课外给我们讲许多关于祖国历史文化、中华英杰的各种有趣故事和知识。进入初中（中正学校），课内课外读的书更多，特别是接触中国现代作家和外国名著”³⁾

无论如何，由于杜运燮大半生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北京）长住，也在中国诗坛闯出名堂，崛起成为九叶诗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因此很多人以为他是中国作家，反而不知道他的南洋身份。杜运燮晚年（1992）时曾经重访他的出生地实兆远，又写了不少归乡纪游诗，后来出版成『你是我爱的第一个』这部诗集，高姿态的张扬他的马来亚身份。此后，在他所出版的书或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断宣称本身的归侨身份，吸引了人们对他南洋身份的兴趣。

孟沙是第一位比较准确的描述杜运燮身份的马华评论家。在其著作『流金记事』（1997）中指出：“他是中国作家；然而他的出生地却是马来西亚的实兆远，认真来说，他也是马华作家。只是他离开故土年代已久远，加上这种客观因素，使他对马华文学的发展显得隔膜和生疏”⁴⁾这个又是中国作家又是马华作家的双重身份，很好地概括了杜运燮。他是一位越界跨国的人物，至少在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地游走，诗想跨越中西文学传统，在写实与现代中兼收并蓄，与中心-边缘不断展开对话。

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例子已经逐渐增多，特别是在台的马华作家群。但是，杜运燮的经历却比较少见，以他一个归侨作家，在中国诗坛却能取得重要成就，感情上又念念不忘自己的出生地。海外身份给他带来麻烦，但是这种

3) 杜运燮，「幻想伴我度童年—山芭纪事之四」，『热带三友·朦胧诗』，第123页

4) 孟沙，「一颗不老的诗心」，『流金记事』，怡保，民生报出版社，1997，第124页

经历又让他的创作有异于中国诗人。他是一位值得探讨的历史人物，他的经历与创作，肯定会给后人许多的启发。

马中两地培育的诗苗

驼铃在1992年在实兆远接待从中国返乡的杜运燮时无意中发现，杜运燮初中时期与马共总书记陈平（王文华）是同班同学，他们都是中正学校初中班的第一届毕业生（中正当年的毕业刊仍然有他们的名字与照片）⁵⁾。也就是说，他们至少有三年的同窗情谊，在当时的这个小地方，肯定是混得很熟。无论如何，在现有的任何文献中，都没有关于他们毕业后继续交往的任何记录。这或许是他们后来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一个加入武装斗争，一个选择文学创作，生命从此没有交集。

但是，说他们生命从此没有交集也不完全正确。实际上，他们还有一层间接的关系，杜运燮夫人王春旭的哥哥王秉慧后来与陈平站在同一阵线，参加了抗日抗英武装斗争。⁶⁾从现在回头看，当初实兆远的地方先贤创办初中的决定是正确的，虽然当时条件很差，无法开办一所正式的中学，而必须由四所小学每年轮办（即中正、育智、国民及明德），但至少在这小地方栽培出两位不可多得的杰出历史人物。

即便在中国的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给予杜运燮厚实的知识与文学训练，但是，他在实兆远的童年与少年时期的生活与学习，同样给他的生命与创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在小学与初中阶段的老师都来头不小，打下了他良好的知识基础与开启他对文学的兴趣，此其一。其二是家乡的自然地貌植被水果给予他许多的想象，成为他日后诗歌创作源源不断的美学资本⁷⁾，尤其是对海的迷恋

5) 这是笔者于2011年3月5日在驼铃先生的家与他进行访谈时所发掘的第一手资料。

6) 与驼铃访谈，2011年3月5日，驼铃家。

7) 杜运燮以热带植物与水果为主题的诗作有8首，即「椰」（1983年）、「椰影·椰汁·椰花」（1992年）、「榴莲」（1992年）、「热带三友之一：椰」（1992年）、「热带三友之

与情结，在童年时代已经萌芽：“我生长于马来西亚霹靂州的一个橡胶园里。住家离马六甲海峡海边不远。那里当时是连片的橡胶园，也是广阔的林海。童年可说是在海边和海‘里’度过的，大海成为我的生命的重要部分。”⁸⁾当他学会骑自行车后，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海：“一旦能这样骑车，我尽快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和朋友骑车到十几英里外的海滨小镇红土坎看海。啊！我终于到了幻想世界中的海滨！“海滨”早就是我心中最美丽、最富有魅力的两个字”⁹⁾。

1934年他在父亲的陪伴下从马来亚乘船到福州继续学业，在船上杜运燮有这样的记述：“几天几夜，在海上天天看海，看浪，看天，看云、看日出日落，白天幻想，夜里梦海，或者梦回橡胶园，让大海把我从橡胶园的童年幻想带进孕育更高层次的幻想的城市现实”¹⁰⁾杜运燮的大海情结使他一生共写了11篇与海有关的诗作与散文。

他的作品写南洋的植物与水果更多，而且并非只向游客那样蜻蜓点水式的记载，而是流露出丰富的南洋在地知识，娓娓道来，有如导游那样带领读者（特别是中国的读者）来南洋旅行与品尝美食。著名的散文「热带三友」如今还是华校的初中课本的范文，诗作「马来亚」（1942）在上世纪40年代便被闻一多选入他所编的『现代诗钞』中，肯定了他在这类主题上的书写。

1938年杜运燮考入浙江大学农学系，因浙大前往贵州，便在厦门大学生物系借读。在厦大学习期间，选修了林庚先生的“散文习作”与“新诗习作”的课后，对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林庚先生的推荐下，1939年秋转到昆明国立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从此正式的走上了一条文学创作的不归路。杜运燮说：“林先生是把我带上爱读诗、爱写诗道路的第一位前辈，并使我对写诗树立初步信心。从那时起，我一直热爱诗，并坚持写了几十年”¹¹⁾。从一位强调“农业救国”“科

二：蕉」（1992年）、「热带三友之三：木棉」（1992年）、「胡姬花」（1992年）、「椰——致新加坡故人之二」。杜运燮以热带植物、水果为主题的散文有「热带水果的魅力」（1951年）、「槟榔」、「热带三友」及「热带果园的皇族」，绝对可写成一篇专文来探讨。

8) 杜运燮，《海城路上的求索》，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第1页

9) 杜运燮，「幻想伴我度童年—山芭纪事之四」，《热带三友·朦胧诗》，第122-123页

10) 杜运燮，「幻想伴我度童年—山芭纪事之四」，《热带三友·朦胧诗》，第123页

学救国”的青年，在良师的影响下，与初中时期的学习与阅读所埋下的文学种子，杜运燮转型成为一位文艺青年。

西南联大的峥嵘岁月

进入西南联大就读的那三年（1939-1941）是杜运燮一生最有意义的日子¹²⁾，也是他在第一阶段写作的序幕，杜运燮说“西南联大是培育我热恋新诗，开始大量写诗的母亲”。我把他这阶段连同整个40年代的创作称为“初熟期”。他在西南联大结识了许多写作上前辈与同侪，不管是在当时，或者后来的创作道路上，包括事业上，都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和影响。在老师辈当中，有卞之琳、冯至、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等，同学辈当中更多，比他高班的，有穆旦、王佐良、赵瑞蕙、林蒲、杨周翰；与他差不多同时的，有汪曾祺、罗寄一、巫宁坤、陈时、萧珊（后来成为巴金夫人）和杨苾；比他低班的，有郑敏、袁可嘉、秦泥、何达等。¹³⁾

朱自清与闻一多是最早发现其诗才的老师，他最初的诗作之一《滇缅公路》受到朱自清青睐，在课堂上分析，后来又写出文章《诗与建国》发表。朱氏把这首诗视为中国诗歌现代化的初步成果：“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这将使新诗更丰厚些。有一位朋友指给我一首诗，至少表示已经有人向这方面努力着，……。他指给我的是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这里不缺少‘诗素’，不缺乏‘温暖’，不缺乏爱国心。……这里表现忍耐和勇敢，真切的快乐，表现我们‘全民族’”¹⁴⁾

闻一多虽然没有公开评论杜诗，但他是最早把杜运燮的诗收入诗选的，即他所编的《现代诗钞》，给予青年杜运燮莫大的鼓励。他经常向卞之琳、冯至、

11) 杜运燮，《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文选》，第4页

12) 杜运燮、张同道编选，《西南联大现代诗钞》，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第1页

13) 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第238页

14) 朱自清，《诗与建国》，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第295页

沈从文等请益，尤其与沈从文交往甚笃，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由沈先生所介绍，能以进入重庆『大公报』任职，虽然只干了一年就回南洋，但是却开始了他与新闻业的不解之缘。

在同侪当中，他与穆旦、郑敏与袁可嘉后来被誉为“联大四杰”。当时，他与穆旦最谈得来，有共同的爱好与相似的诗观，从穆旦那边，他知道了更多英国诗人，包括曾经在西南联大执教的燕卜苏。“在写诗方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我也就怀着更浓厚的兴趣继续写诗”。杜运燮很重视与这位诗友的感情，在文革时他们在患难中互相鼓励扶持。即使穆旦死后20年，他还是不辞劳苦、公而忘私的为编选『穆旦诗全集』与『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而四处奔波，甚至耽延了整理自己所要出版的作品¹⁵⁾。杜运燮去世时，穆旦的儿女从美国寄了一张悼念卡给杜的老伴李丽君，表扬杜运燮的精神，说若非杜伯伯如此的奔波劳累收集整理他们父亲的作品，穆旦的知名度不可能越来越提升¹⁶⁾。

在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时，杜运燮读外国诗较多，让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英美现代派的创作与理论大开眼界，直接的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作的影响，同时也形成了他的诗观：新诗必须继续借鉴外国诗，才能切合时代与有所开拓，“这没什么可耻，并非“数典忘祖”，……需要“洋为中用”。不能把新诗现代化与西化混为一谈。”¹⁷⁾“因同是现代人，某些共同的感情波涛，共同的痛苦与反思”¹⁸⁾

在众多英美现代派诗人当中，奥登给予杜运燮影响最大¹⁹⁾。他的诗，特别是四十年代写的，具有奥登式的机智的反讽、辩证的反思与冷凝的激情，同时

15) 与杜海东访谈，2011年4月28日，北京京师大夏酒店。

16) 笔者2011年4月26日在北京李丽君寓所与她进行访谈时，她给笔者看了当时穆旦儿女从美国寄来的悼词。

17) 『世界文学』双月刊，1989年第6期

18) 杜运燮，「在外国诗影响下学写诗」，『热带三友·朦胧诗』，第232页

19) 杜运燮说：“英国青年奥登对我有几方面的吸引力：一、写同时代人的独特历史经验（当代性），二、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对现代社会众生相观察敏锐，视野广阔，综合概括力很强，文字明快凝练，警句频出，笔端常露机智与冷讽；三、讽刺诗辛辣而含蓄，常寓严肃于轻松，具有高层次的幽默感，又有令人愉快的对现实的针砭”。

扣紧现实生活，如他这时期的代表作『滇缅公路』。因此，也是杜运燮九叶诗友，四十年代便开始关注与评论杜诗的唐湜，称这首是中国抗战时期最好的史诗之一，“与艾青、田间们当时抒写的悲壮的抗战诗篇相比毫无逊色的。且由于奥登式的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以机智的反讽揭发了更深刻的内在矛盾，力度也有更大的发挥，诗的艺术也就更加丰富，更加高度地凝练。”²⁰⁾

无论如何，他对西方现代派的理论与技巧并非盲目的跟风，而是有自己的选择标准：“我并不想模仿那些现代派名家的晦涩难懂，更不愿在思想感情上盲目模仿他们，而是尽可能做到为我所用，尽可能写得易懂些。“我喜欢现代诗，但是不能把西方现代诗模式照搬到中国诗坛，至少对它颓废的、悲观的一面，我们必须要知道所扬弃”²¹⁾

从那时起，杜运燮便在诗创作上开始“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²²⁾，意思是以现代主义的手法来抒写现实的情感，“中国三、四十年代，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抗战时代，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意识高涨，反映在新诗里，虽然手法上是现代的，但感情上仍然离不开现实主义”。这种风格倾向，他似乎贯彻始终，“我没有“衰年变法”的打算，将仍然走许多人为我定位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结合”的道路”²³⁾。

在这段西南联大的峥嵘岁月里，杜运燮一共创作了20首诗作，包括深获好评的『滇缅公路』、『马来亚』、『追物价的人』、『露营』、『月』等²⁴⁾。他的这一时期成就（包括在印度从军时写的作品），集中表现在1946年巴金为他出版的『诗四十首』（列为巴金主编的『文艺丛刊』第八集）。由于当时他生活在中国的年日不长，虽然受到中华民国抗日救亡民族自强的激情所振发而写出表扬抗战无名英雄的『滇缅公路』，但是他的南洋经历也使他忧心出生地的沦陷而写出发

20) 唐湜，『杜运燮论』，『诗探索』（理论卷），1998年第3期，页29

21) 孟沙，『一颗不老的诗心』，『流金记事』，第126页

22) 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第236页

23) 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第260页

24) 其中『露营』、『月』被评者称为“最足以代表（诗歌）现代化倾向”、“代表了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等。余峥，『智性透彻于生命—诗人杜运燮论』，『理论学习月刊』，1995年第7期

聳振聵的「马来亚」，流露出他当时的双重认同与双重经验，而实际上这种情感后来连系着他的一生。这方面的创作与心理倾向很值得马华研究者的关注，笔者已写了一篇专文讨论之²⁵⁾。

缅甸印度从军西天缘

大三的时候，杜运燮走向了一个人生的奇异之旅，因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当时规定，凡是大学外语系的三年级学生，可以参军当翻译，两年回来后可算毕业。许多西南联大的同学都参军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²⁶⁾晚年的杜运燮把这段经历称作“西天缘”。有如唐三藏到西天取经，而他却到西天参加抗战，负起了一位堂堂正正中国人在国难当前所应尽的天职。他选择参军，不管是出于自愿或历史的“偶然”，也意味着他转向了中心的位置，与其他中国同学一样的爱国，准备为国捐躯稀释了他南洋的边缘身份。无论如何，他的这段西天经历也在文革时期给他带来麻烦，使他背负着难以解释清楚的历史包袱。

当时，他被安排先在云南的昆明、沾益及湖南的芷江任“美国志愿空军大队”（即“飞虎队”）翻译一年；后赴印度比哈尔邦的“蓝伽（Ramgarh）训练中心”，任“中国驻印军”翻译两年多。这个训练中心是美国帮助中国训练军队，援助中国抗击日本的大本营。这段从军经历虽然艰苦，但也开拓了诗人的视野，训练了他坚韧的毅力，使他的创作更贴近现实。

临终前，他通过口述，由小儿子杜海东笔录的『西天缘』（未完成）中讲述说：“从1943年初到1944年初，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多，1944年我们沿利多到昆明的史迪威公路回国。”²⁷⁾前半期在蓝伽的那一年多，在工作之余，他和一些友伴访问了名胜古迹，包括释迦牟尼修炼成佛的菩提伽亚（Bodigaya）、唐玄奘

25) 许文荣，『搭建中国与南洋的文学桥梁——论杜运燮创作中的双重经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28日至30，北京师范大学会议论文

26) 杜运燮口述，杜海东笔录，『西天缘』，『热带三友·朦胧诗』，第2页

27) 杜运燮口述，杜海东笔录，『西天缘』，『热带三友·朦胧诗』，第3页

曾经留学与讲经的那烂陀等，也有机会买了当时中国国内所看不到的外文书『历史的研究』、『世界地理』等经典著作。后半期从印度回国的路途，经历则非常的艰辛与惊险。美、中两军合力修筑公路，伐树炸石，开出道路，一段段向昆明挺进。杜运燮便是在崇山峻岭中开凿的这条公路上，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惊险，开着车子一步步的随军回到昆明。

印度从军这三年的奇特经历，让他从文艺青年成为军旅作家，激起了他不同的创作灵感，完成了16首诗作，包括倾向于古朴与清丽风格的「山水」、「水上」（1943）、「月」、「夜」（1944），当然写得最好的还是反映抗战现实与表现当地风土民情的诗作如「埋葬」、「草鞋兵」（1943）、「给永远留在野人山的战士」（1944）、「悼死难的“人质”」（1944）、「林中鬼夜哭」（1945）、「流浪者」（1944）、「恒河」（1945）等，这或许是他具有亲身体验，写起来更是感情真挚，同时也发挥了他咬住此时此地的写实功力。

南洋执教谱热带风光

三年多的参军让杜运燮从边缘走向中心，参军回来领取毕业文凭后，在沈从文的推荐下，他进入报界工作，成为重庆『大公报』的国际版编辑。从这样的际遇看来，杜运燮可以继续在中原大展拳脚，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中国诗人，就如一些当代旅台作家一样。无论如何，杜运燮只在重庆『大公报』任职一年，便又选择回到马、新，回到他边缘的地带。

若从他1944年从印度回昆明，办完毕业手续，以及后来在重庆工作一年的时间来推算，最快也得在1946年才能回马来亚。当时他不可能只是休假回家探亲而已，若是这样他应该很快又会中国，不管是回『大公报』，或找其他新工作。但是，当时他回家乡实兆远探亲不久，就到新加坡从事教育工作。这说明了他原本有意想把本身所学贡献给他的出生地—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因当时马、新一家）。

笔者在2011年9月6-11日到新加坡进行田野考察后，确定了他在1947-1949年在南洋女中任教，从1947年的？周年校刊与1949年的学生毕业刊都有他的照片与资料²⁸⁾。其中毕业刊里还有他担任班主任的记录。当时新加坡学校是在年中开学到另一年的年中结束，笔者在1949与1951年的华侨中学的文献中都没有杜运燮的任何资料，只在1950年的毕业刊发现他的一张人头照列在“本校教师”栏里，而我们很确定他在1950年中便去了香港，因此他最可能在华中执教的期限是从1949年中至1950年中，因被英政府强行解雇才转到香港工作。至于为何他会从南中转到华中，原因则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他到华中不久，就卷入华中学生的保校抗争运动中。英殖民政府为了要斩除左派的实力与淡化华教的色彩，实行了一些新的政策，如强制学生必须参加以英语为媒介的会考，禁止学生阅读含左派意识的书籍，使学生群起抗议，占据学校。杜运燮在这抗争中，坚决支持与站在学生这边，并经常在讲演中向学生讲述他在印度的从军经历，鼓舞学生坚韧不拔的继续抗争，反抗英殖民的霸权。杜运燮当时是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不管是他在课堂内灵活生动的教学，或者他在课外和学生的亲密互动，都很得学生的敬爱。²⁹⁾这样具有影响力的老师，当然很快就受到英殖民者的注意，必然想早日除之而后快，因此杜运燮被解雇乃是意料中事。

在新加坡三年多执教期间，是杜运燮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丰盛期。³⁰⁾他与几位友人（何扬、林彦群及张漠青）在1947年11月创立『学生周报』³¹⁾，以南洋

28) 笔者于2011年9月7日与8日分别访问了新加坡华侨中学与南洋女中。与华中文物馆负责老师杨惠珊与南中副校长刘雪玲博士进行访谈，并获允翻查了1940、50年代的文献。

29) 有关杜运燮在华中的经历，笔者是通过与著名字典专家杨贵谊先生的访谈中得知。杨先生在1950年初曾经上了杜运燮一个学期的中文课，非常欣赏他讲解文学作品的风采，并对他当时在学生面前的公开演讲记忆犹新。与杨贵谊先生访谈，杨贵谊家，2011年9月7日。

30) 杜运燮1940年代“初熟期”的创作可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在联大求学与印度从军时的创作（1940-1945），以『诗四十首』为标志；第二期是在新加坡的创作，散文以『热带风光』为代表，诗作后来收录在1984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南音集』。

31) 此『学生周报』与后来由香港『中国学生周报』在新加坡创办并在马新两地发行的『学生周报』不是同一个出版物，前者于1948年便已停刊，后者是在1956年才出版。前者由杜

女中与华侨中学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四开小报，后来也发展到马来亚、印尼、泰国等地。『学生周报』共有4大版，大致内容如下：第一版：有关时事介绍；第二版：“学府瞭望哨”。介绍南洋各地的侨校情况；第三版：“流动图书馆”，刊载有关辅导学习的文章；第四版：“艺文”，经常刊载学生的文艺作品，组织过征文竞赛，鼓励学生们的文艺创作。『学生周报』销售量最多时达到1000多份。1948年6月马新英殖民地政府颁布剿共紧急法令后，『学生周报』便被迫停刊，但在当时本地出版物贫瘠的时代，这个连续性刊物给予读者的启迪还是不小的，用杜运燮自己的话说：“几时年来，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支持过『学生周报』的校友和其他校友（读者），……成为专家、学者、教授、副教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³²⁾

杜运燮当时在『学生周报』发表了三首诗作，即「狗」（1948）、「我是尾巴」（1948）、「落叶」（1948）³³⁾，主要以轻松的嘲讽与挖苦见长。但他当时写的诗不多，反而比较专注在散文的创作。他这段时期的散文创作最为人所津津乐道，后来收录在1951于香港出版的『热带风光』。晚年杜运燮在回忆中说这些散文是带着他的南洋印记的：“散文集『热带风光』中的十几篇文章，是我于1947至1950年先后在新加坡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教书时业余写成的。因为我的父母的大半生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时在马来西亚度过的。”³⁴⁾

无论如何，当时这些散文的诞生实际上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时我业余时间主要用于研究马来亚的史地民俗并学习马来文，想写一部反映华侨拓荒历史的长篇小说。那些散文就是写小说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是类似读书札记性质的副产品。”³⁵⁾无论如何，由于这些散文最初选择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使到他采取了导游般的视角，向中华圈读者推介南洋的异国风情。由于他写作前做

运燮与一班文友私下经营，后者由香港某文化集团来操办。

32) 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第206-209页

33) 其中「狗」和「落叶」是杜运燮所喜爱的两首，后收录于『九叶集』（1981）、『南音集』（1984）、『杜运燮诗精选一百首』（1995）、『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选』（1998）及『杜运燮六十年诗选』（2000）

34) 杜运燮，「致xx先生」，『热带三友·朦胧诗』，第265页

35) 杜运燮，『海城路上的求索』，第6页

了很好的功课，在加上他的南洋生活经历，故能以丰富的在地知识与深度描写下笔，知识性与趣味性兼备，具有很高的可读性。从这样的创作动机看来，杜运燮又似乎是自觉的以边缘的南洋口音，向中原读者讲述南洋的掌故与故事。最著名的「热带三友」则通过热带三友与岁寒三友的比照与叙说，大展他对两地植物的丰富知识，也流露了他对南洋与中国两地的微妙情感，孰重孰轻，难以衡量。³⁶⁾

杜运燮在新加坡这段时期总共创作了17首诗，最受论者所关注，同时也是杜运燮本身最喜爱的，是「狗」³⁷⁾与「善诉苦者」³⁸⁾，皆是嘲讽与挖苦当时的懦怯的知识分子，只会一味的抱怨与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不知道如何去直面现实与发现问题本质。他也陆续地在辛笛等文友在上海所创办的『中国新诗』上发表诗作，总计约有14首，数量虽不多，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与编者交流创作经验，越来越发觉他们有很相似的创作理念与诗观。这样的关系，为他们后来出版『九叶集』进行酝酿，也使他们后来崛起成为九叶诗派。

下放山西赴中原补课

“文革期间，我作为一个“臭老九”、“旧社会来的”、“海外回来的”、“历史负责、社会关系复杂的知识分子”（杜运燮）³⁹⁾在这么多罪名下，他当然要被改造，结果在1970-1979被下放到山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段时期是

36) 许文荣，『搭建中国与南洋的文学桥梁——论杜运燮创作中的双重经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28日至30，北京师范大学会议论文

37) 原载新加坡『学生周报』，后收录于『九叶集』（1981年出版）、『南音集』（1984年出版）、『杜运燮诗精选一百首』（1995年出版）、『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选』（1998年出版）、『杜运燮六十年诗选』（2000年出版）

38) 原载『中国新诗』（第3期），后收录于『九叶集』（1981年出版）、『南音集』（1984年出版）、『杜运燮诗精选一百首』（1995年出版）、『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选』（1998年出版）、『杜运燮六十年诗选』（2000年出版）

39) 杜运燮，『答香港『诗』双月刊王伟明先生』，『热带三友·朦胧诗』，第254-255页

他一生最艰难熬的年日，他甚至被解雇而身无分文，为了生存只好当农民靠挣工分维生，从一位摇笔杆的文人变成一位执锄把的下农，再加上夫人王春旭因受不了如此的巨变而患上抑郁症，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无论如何，杜运燮是个乐观主义者，在任何逆境中仍然能够保持心境的平衡，把危机转为时机。

被英殖民政府解聘离开新加坡后，他先到香港『大公报』与『新晚报』担任翻译与编辑工作一年。1951年在联大老同学的引荐下，进入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新华社为中共政府的机关新闻社，他以一位海外归侨的身份进入这样的禁地，让他事事都得非常谨慎低调。⁴⁰⁾也就是说，杜运燮对其海外的边缘与敏感身份是具有充分直觉的，也在心理上与处事上尽可能去适应新环境，甚至牺牲了他的创作来迁就现实，无论如何，他仍然还是无法避开铺天盖地的文革海啸，最终还是在1970年被下放到山西农村。

无论如何，事情都有正与负两面。虽然被强迫从城市移居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后又被新华社解雇，面对断炊之虞。但另一方面，这段时期的生活却让杜运燮有机会与大儿子杜实甘一家度过一段患难与共的日子与享受天伦之乐，这个过程后来他的大儿子杜实甘有很详细的追述。⁴¹⁾另一项对他比较正面的，是在1974年后他总算脱离了私通海外的嫌疑，重新恢复了他的公职，但是，不是回新华社，而是到山西师范学院任教，从外语系教师一种担任到系主任。这是他第二次重执教鞭，上一次在南洋，这次在中原地区。他当时顺应大环境而实行了“开门办学”的方式，不限在课堂上的学习，而是带领学生到附近名胜与历史古迹去进行实地考察。与此同时，在巴金的鼓励下（也给他寄了不少书），他借此机会读了许多中国文化的古书，结合他的田野考察所得，在中华文化的知识上增补了许多，后来他索性把这段经历称为“中原补课”。这“中原”补课与他“边陲”的出身形成微妙的辩证。就是意识到本身的海外边陲孤儿的身份，使他更加积极的想吸取更多的中原文化，以强化本身的中华性，不管在往

40) 杜海东分析他父亲的性格时说：“杜运燮的人太好，太老实，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为人非常低调，性格也较为平和”。笔者与杜海东访谈，2011年4月28日，北京京师大厦。

41) 杜实甘，「无法忘却的时光」，《热带三友·朦胧诗》，第372-379页

后的生活上或创作上，可以让自己更有在地人的特征。正如他在『中原补课』(未完成)中说：“海外归来的炎黄子孙得以生活在华夏文化的发源地”(诗经场景、晋国遗址、尧庙、仓颉造字处等)，岂能不善加把握，在“补课”上多下一点工夫。⁴²⁾

50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整20年是杜运燮创作的低沉期/空白期，只正式发表了两首诗作，即1957年创作的「海」、「雪」，成就也不突出。

重返北京憾夫人病逝

文革结束之后，杜运燮于1979年回新华社复职。后来他以新华社资深编辑的身份，有机会随国家领导到欧洲、东南亚等地访问考察。他忠于职守，一直到1986年退休后，便全职投入写作。1980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看来好像想挤入/被接纳成为主流，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位挂名的中国作协会员，在这组织中一直都不活跃。

回到北京不久，最让他伤心的，莫过于陪伴他30多年的夫人王春旭的病逝，夫人的早逝与文革时期被下放山西农村的艰苦生活与心理煎熬不无关系。杜运燮一生有三个女人，第一个是在福州古田家乡迎娶的原配夫人，那是他还未进大学，是家人在威迫利诱的情况下与原配夫人完婚，并育有两个女儿。⁴³⁾无论如何，由于是被逼婚的，他与这位原配夫人没有感情，后来他读大学后，就逐渐与她疏远了。在迎娶王春旭之前，便与她正式离异。从这件事可看出杜运燮性格的双重性，有时服膺于传统或权威，有时又敢于追求自己的理想或真爱。

杜运燮第一位真正有感情的女人是他的同乡王春旭。出生于实兆远的王氏后

42) 杜运燮口述、杜海东笔录，「中原补课」，『热带三友·朦胧诗』，第5-6页

43) 杜运燮被逼婚曾娶了原配夫人这件事，是笔者与杜海东访谈中无意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过去从未有论者知悉杜运燮的第一段婚姻，一位王春旭是他的第一任太太。后来这位原配夫人与杜家有来往，目前她随其中一个女儿住在美国，另一个女儿住在古田老乡。笔者与杜海东访谈，2011年4月28日，北京京都大厦。

来也到大陆去留学，就读山东的某所高校。当时很少有南洋女青年有机会到中国读大学，王春旭的例子是很特殊的。她于1945年毕业后便与杜运燮结婚，婚后跟随杜运燮三十多年，从重庆、马来亚、新加坡到北京、山西、后又重返北京，周周转转。王春旭在杜运燮下放山西时，心情非常的低落。她认为杜运燮是应国家召唤华侨回国服务而回来，奉公守法，兢兢业业，然而却遭到下放农村的命运，令她心情非常的激动，因此便公开的骂林彪江青，但结果反而连累了杜运燮，被新华社解雇，使到她的心理压力更大。杜运燮到山西师大教书后，王春旭的情绪相对比较稳定，但是由于积忧成疾，身体状况逐渐走下坡。杜运燮复职重返北京后，本来是非常值得兴庆的事，然而她的病情恶化，最终于1981年逝世。她去世后不久，杜运燮写了一篇散文「小油灯」悼念她，感叹她一生只为别人付出，却没有了自己，就如小油灯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⁴⁴⁾

王春旭死后第二年，杜运燮在过去新加坡执教时的一名学生的拉线下，认识了电台主播李丽君。李丽君也是一名归侨，在菲律宾马尼拉出生与长大，青年时代才随家人迁徙到中国定居。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英语播音员，一直到退休，因此英文造诣很高，这是他与杜运燮的第二相似点。此外，他们还有共同的性情与兴趣，尤其是旅游。认识不久后，他们就很快结婚了。杜运燮把李丽君称为老伴，意思大概是“老来所娶的伴侣”。婚后他们生活很写意，经常结伴到各地去旅行，国内走了很多地方，国外也去了美国、新加坡等地。旅途中激起了杜运燮的诗情，每到一个地方都留下诗作，因此杜运燮晚年写了不少纪游诗，写得较好的有「西湖」（1983）「寒山寺」、「杭州飞来峰」、「秦兵马俑」、「古丝路」及「仙人掌：逆境中的胜利者——美国观花印象之一」。杜运燮曾经在1982年给她写了一首诗：「我们相逢在秋天 ——给D」⁴⁵⁾，记述他们从认识到结合的简单而又浪漫的经历，文字充满诗情画意，是一首很有可读性的短篇情诗。

44) 杜运燮，「小油灯」，《热带三友·朦胧诗》，第165-166页

45) 收录于『八叶集』（1984年出版）、『晚稻集』（1988年出版）、『杜运燮诗精选一百首』（1995年出版）、『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文选』（1998年出版）、『杜运燮六十年诗选』（2000年）。

「秋」篇激起朦胧诗论争

1980年代初在大陆沸沸扬扬了两年多的朦胧诗的论争，实际上是因杜运燮而起的。他写于1979年的「秋」，隔一年刊登在诗刊上后，便被论者指责为是一首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诗，并把它贬为“朦胧体”的诗，从此“朦胧诗”的名字便不胫而走，争论之声此起彼落。对于引发了这场文学论争，以及其诗被指为朦胧不知所云，一向不主张写“晦涩难懂”的诗的杜运燮本身也是出乎意料：“当然，做梦也没想到，我在1980年『诗刊』上发表的「秋」，竟会成为被公开指责为“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的“朦胧诗”的第一首诗”⁴⁶⁾。这个案可看出文学论者与作者观点的巨大落差，因为对杜运燮来说，这首只不过写得教含蓄委婉的诗作。

无论如何，当时有人反对这样的诗风，有人却赞同这样的美感，形成了对持的局面。基本上新生代诗人比较认同这样隐而不露、委婉含蓄的创作风格，他们同仇敌汽，站在同一阵线上来支持朦胧诗，并宣称读懂不懂不是诗的关键，“你看不懂，别人未必看不懂”。新生代作家与前行代作家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无论如何，在往后的论争中，始作者杜运燮却完全缺席了，论者焦点反而集中在几位青年诗人如舒婷、北岛、顾城等的身上。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杜运燮并没有积极参与这项论争，只回应了一次，交代了他写这首诗的想法与为何这么写⁴⁷⁾，之后就鸣金收兵。这与杜运燮一贯的谨慎与低调处世态度是相符的，更何况他曾经经历文革的不愉快经验。实际上在这论争期间，中共高层领导之一的胡乔木曾经召见了杜运燮，当面称赞他的诗写得很好⁴⁸⁾，换着别人，这件事可要大事张扬了，不管是在当时或过后，但杜运燮完全绝口不提此事。笔者是和他儿子杜海东的访谈时经他所转述的第一首资料。平心而论，杜运燮的「秋」确实写得很好，展示了他的不凡的文字功力，借着自然界的种种物象与景象来展现新时代的降临，并对这新时代的表现出乐观的态度。文字在含蓄

46) 杜运燮，「在外国诗影响下学写诗」，《海城路上的求索》，第269页

47) 杜运燮，「我心目中的秋天」，《热带三友·朦胧诗》，第215-218页

48) 笔者与杜海东访谈，2011年4月28日，北京京师大厦

中又流露时代的信息，在形与神中收放自如，恰到好处。难怪后来其诗友唐湜为他打抱不平，认为当时的新生代诗人总以为一切都由他们“从零开始”，实际上杜运燮才是第一首朦胧诗的创造者，而运用现代派的手法写诗，更早在30、40年代的李金发、冯至、卞之琳、穆旦、郑敏等，已经收获了不凡的成就。⁴⁹⁾

九叶奠定诗坛一席位

1981年杜运燮与其他八位诗友联合出版诗集——『九叶集』⁵⁰⁾，这是中国诗坛、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也让他正式崛起成为九叶派诗人之一。这八位诗友是穆旦、郑敏、袁可嘉、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及唐湜。前三位是杜运燮在联大的同学，后五位是1940年代中后期与杜运燮同时活跃于『诗创造』与『中国新诗』的编辑与写作群。40年代他们这九人已经开始从事诗创作，不过并非一开始就有诗派的概念，1970年代末之前，他们甚至并没用真正聚在一起过。他们这九位诗人基本上可分为南北两派。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及唐湜属于南派，以上海为据点从事编辑的工作，创立了『诗创造』，出版了十六期（1947. 7-1948. 10）。后来又改为『中国新诗』，出版了五期（1948. 6-1948. 10）。⁵¹⁾另外，杜运燮、穆旦、郑敏及袁可嘉从联大毕业后，都选择居住在北京教书与工作，属于北派。无论如何，这两个诗刊使他们开始有交集，因为不只经常发表诗作，而且在诗作里，以及正式与非正式的文字交流中，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很相识的诗观与创作倾向。

1970年代末期，他们才相约在北京聚首，追认了当时他们的诗观与诗风，都一致地同意出版一部诗集来见证他们在40年代的创作与伙伴关系，因此就编辑出版了这部后来非常有影响力的『九叶集』，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所谓的“九叶诗派”的命名。袁可嘉客观与贴切地概括了他们这九位诗人的独特诗风：“比

49) 唐湜，「杜运燮论」，『诗探索』（理论卷），1998年第3期，第31页

50) 穆旦、杜运燮等，『九叶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51) 蓝棣之，『九叶诗派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2页

起当时的有些诗来，他们的诗是比较蕴藉含蓄的，重视内心的发掘，比起先前的新月派、现代派来，他们是力求开拓视野，力求接近现实生活，力求忠于个人的感受，又与人民的情感息息相通。在艺术上，他们力求知性与感性的溶合，注意运用象征与联想，让幻想与现实相互参透，把思想、感情寄托于活泼的想象和新颖的意象，通过烘托、对比来取得总的效果，借以增强诗篇的厚度和密度，韧性弹性。他们在古典诗词和新诗优秀传统的熏陶下，吸收了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诗人如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的某些表现手段，丰富了新诗的表现能力。”⁵²⁾ 『九叶集』选收了杜运燮的12首诗作，比较倾向与受现代派影响的奥登式作品，以活泼的想象与幽默的嘲讽见长，尤其是「追求物价的人」、「狗」及「善诉苦者」。无论如何『九叶集』不只凸显杜运燮的诗歌成就，而是整体的诗派成果。因此，杜运燮在诗坛上的地位也水涨船高，被写进中国文学史，获得中原地区前所未有的认同。

实兆远是爱的第一个

1992年，退休后全职写作的杜运燮，在收到一群南洋学生所赠送的寿辰贺礼后，决定以此为旅费回返久别的故乡实兆远。这次回乡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因为已在中国诗坛占有重要席位的杜运燮，本来可以放弃南洋的边缘身份，以地道的中国人自居。但这次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行动，证明了他无法割舍本身的南洋情，同时也显示了他情感上的双乡观念。这次的归返是他离开了生育他的土地四十多年之后，首度如迷失的候鸟般终于找到归乡的方向。重新踏在故乡的土地上，他的心情是激动而又充满感慨的。曾经在这块由胶林包围的土地上生活了十六载，为了求知为了未来而离乡背井，回到他的第一故乡福州（古田）去升学⁵³⁾，光阴荏苒，从当年的少年不识愁滋味，转眼已是白发

52) 袁可嘉「序」，『九叶集』，第16页。

53) 杜运燮曾经自述说，他的第一故乡是古田，第二故乡是实兆远，第三故乡是北京。但实

苍苍的老头翁，令人不胜唏嘘。无论如何，这个曾经是他接受启蒙教育的摇篮，哺育他早期思想成长的土地，不管他身在何处，都一直在他心中闪着乳白色的光芒。

为了记载他这趟返乡从北到南一个月的“壮游”，他写了23篇归乡纪游诗，马来西亚部分12首，关于重游新加坡有感而作的诗歌11首。这些诗歌后来由霹雳文艺研究会为他出版为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这是他唯一在马来西亚出版的诗集，弥足珍贵，具体地标志着他也具有马华作家的身份。虽然这些诗由于是纪游诗，随手拈来、直言其事，文艺成就不是非常突出，但是却非常具有文学史的意义。笔者曾经撰写了一篇文章谈杜运燮与这部诗集，认为里头的诗作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应该是那饱含情意的文字，以及对他过去所熟悉的物象与景象的新观照。⁵⁴⁾他本身自述道：“很显然，如果没有亲友邀请得以实现此次重访，没有各地作家朋友们的热情接待，新添那么多美好印象，增加那么多对马、新几十年来巨大变化的新知识，激起那么多的回忆和感情波涛，我当然写不出十几首纪游诗。”⁵⁵⁾四十多年压抑的乡情、土地之情、亲情、新添的友情顿时如山洪般倾泻而下，情感的广度与厚度岂能不凸显？再者，他重新吟咏椰树、木棉、芭蕉、榴莲等他过去非常熟悉的物象，与之前的散文形成诗与文的互文效果，留给研究者不少可继续研论的空间。

他这次回乡后，与马来西亚的不少作家与文学组织建立了关系。回返北京之后，他也继续与这些文友联系，给予他们文学上的意见和鼓励。后来，与杜运燮书信往来最频密的是驼铃。他们之间从1992年至2000年有许几十封书信往来，驼铃先生收到杜运燮寄来的信共有36封，他已把这些书信都交给我，我将另文谈论这两位作家的鱼雁之交。杜运燮对驼铃有很大的影响，其中一项是鼓励驼铃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杜运燮读了驼铃所写的中短篇小说后，认为驼铃的文才不应该只局限与中短篇，而应该尝试长篇小说创作。由于受到杜运燮的

兆远却是他爱的第一个。

54) 许文荣，「杜运燮诗歌中“情感”与“形式”的动态关系——以南洋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为个案分析」，《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第35-41

55) 杜运燮，『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怡保，霹雳文艺研究会，1993，第2页

佳赏，驼铃后来便开始从事长篇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寂寞行者』也在2006年出版⁵⁶⁾，为马华文学好多年来的长篇小说荒补上新货源，杜运燮间接之功也得记上一笔。

另外一个与杜运燮关系比较密的文艺刊物是『清流』，第53期有刊出杜运燮的诗作「九种朦胧」，以嘲讽的语调调侃中国人对“朦胧”的情意结。⁵⁷⁾没想到在下一期出版前便传出杜运燮往生的噩耗，因此2002年7月出版的『清流』第54期，马上制作了一个7大页的特辑，名位“朦胧诗人杜运燮特辑”，纪念诗人的陨落。该特辑刊出了新华社前『瞭望』周刊编采负责人王枫的来函，报告了杜运燮临终前的经历，以及刊出杜运燮的几首诗，即「秋」、「榴莲」、「椰影、椰汁、椰花」，以及主编王涛的一首悼念诗「不再朦胧」。⁵⁸⁾这是马来西亚文学界对杜运燮的逝世所表达的唯一悼念形式！

落实两点创第二丰收

从1979年下放山西归来，到2002年往生⁵⁹⁾，是杜运燮创作生涯的第二丰收期，特别是他在1986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可说是全情投入写作，他自己晚年的人生规划是“读一点写一点”，在落实两点下，总共写了182篇诗作，比40年代的第一丰收期的86首还要多，主要收录在『晚稻集』、『杜运燮诗精选一百首』、『杜运燮六十年诗选』、『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文

56) 驼铃，『寂寞行者』，吉隆坡，马来西亚燧火出版社，2006

57) 『清流』，2002年01号（总第53期），第104-105页

58) 『清流』，2002年02号（总第54期），第80-87页（收录在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www.mcldl.com）

59) 实际上杜运燮逝世前两年经常出入医院，但他仍然还有进行创作，散文方面有由他口述，由儿子杜海东笔录，写了「西天缘」与「中原补课」两篇，但都没有来得及完成。诗歌方面写于2002年1月的「岁月如歌」，是他有标明写作日期的最后一首。无论如何，他在2002年『清流』第53期中发表了一首嘲讽诗「九种朦胧」，没有收在他之前的任何选集里，应该是也是他最后人生阶段的诗作，至于写于何年则有待查考。

选』这五本集子里头。他本身谈自己的创作时期时说：“我写诗只有两个阶段，即四十年代的十年和七十年代以来的十几年，五十年代只发表过二首，六十年代是完全空白”⁶⁰。这时期的诗，嘲讽与挖苦的意味稍微减少了，文字的抒情性哲理性更浓厚些，文字更倾向于灵妙隽雅，题材风格更趋向多元。这时期由于有机会跟随国家领导出国公干，退休后又和老伴李丽君去了不少地方旅游，因此也写了不少纪游诗，知性与感性互相溶合。另外写的较好的还有一些咏物诗，这类诗较富有古朴之风，写得相当的优美隽秀。总的来说，这段时期的创作与40年代的诗风有些转折，比起前个阶段较浓厚的现代派色彩，此时沿华落尽见真纯，表现手法虽更加的朴质，但是诗想更加深邃，诗艺更臻成熟。笔者认为，他这时期的代表作是「秋」、「曾经」、「火」、「秦兵马俑」、「我们相逢在秋天——给D」、「故乡毕竟是故乡」、「古丝路」、「你是我爱的第一个」、「物是名非」、「恋龙情结」、「漫步圣迭戈海边有感」及「八十自语」。

骨灰撒大海魂归故乡

诗人杜运燮不幸于2002年7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他一生阅历丰富，住过马来亚、福州、厦门、昆明、缅甸、印度、重庆、新加坡、香港、北京、山西等地，访问过德国、美国等地，当过编辑、翻译、军人、教师、新闻工作者、农民、大学讲师等工作。从1940年开始到他去世，他一生写了268首诗作，62篇散文与杂文。他也一生致力于新诗的现代化，卓有成就。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实践，也成为沟通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的桥梁。

至于他到底是中国作家？还是马华作家？实际上他两者都不是，又两者皆是，也就是说他即是中国作家，也是马华作家，是个双栖的作家。这样的身份可以从他一生在两国两地不断地跨界，何者是中心，何者是边缘，并不能单纯的从他居住期限的长短来断定，而是要从他的处世态度、内在情感与诗文创作

60) 杜运燮，「答香港『诗』双月刊王伟明先生」，『热带三友·朦胧诗』，第259页

中去思考。他处世态度谨慎低调平实，看不出具有中心/中原的个性，即便在他最风光的时候，也不会表现得很高姿态，似乎对本身的边缘身份有很深的自觉。大儿子杜实甘说：“父母华侨出身的背景，工作单位的政治性质，右派朋友的遭遇，多次政治运动的历险，再加上永远交代不清的“历史问题”和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等诸多因素造成了他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处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⁶¹⁾华侨身份似乎成了杜运燮与家人的原罪，使他不得不行事格外谨慎。但这原罪杜运燮没有试图逃脱，而是逐步的更确认自己的海外身份。正如杜海东转述父亲生前的话说：“他说他一生始终与海外分不开：他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他的诗歌创作受海外现代诗创作影响最深，他的散文大多是写海外风光、华侨历史和受海外诗歌影响的中国现代诗歌问题的，他的诗歌和散文成名作『滇缅公路』、『热带三友』也都与海外有着密切的关系”⁶²⁾

在情感上，虽然大半生居住在北京，但是他的第一故乡却是福州古田，出生地实兆远却是他所爱的第一个，北京反而是他的第三故乡。他居住得最久的国家是中国，但是一生却念念不忘马来亚，即使他死后，也要把骨灰撒在离他出生地不远的邦咯岛海域上。这样的意愿也表明了他对马来亚的不离不弃，生前不能长久住在这里，死后想永久躺卧在故乡的大海上，因为他从小就对故乡的海很着迷。

他的创作更是多种文化激荡下的共同产物，既有早期西方现代主义养分的吸收，也有反映南洋蕉风椰雨风土民情的文化散文，更有借鉴中国诗词表现手法的推陈出新的诗篇，抒情、知性与哲理微妙的溶合，轻快、幽默、嘲讽、挖苦、矛盾、反思、含蓄、朦胧融为一体。他提倡文学中的杂交，以培育出优秀的文学品种。⁶³⁾他的诗观、诗想、诗艺与诗作留给后人丰富的文学遗产。

钟怡雯在最近在吉隆坡发表的论文「杜运燮与吴进——一个跨国文学史的案例」，把杜运燮的创作一刀切截然二分，说吴进（主要是40年代末50年代写南洋散文的阶段）是属于马华文学的，杜运燮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⁶⁴⁾，这种划分过

61) 杜实甘，「无法忘却的时光——记父亲在山西农村的日子」，『热带三友·朦胧诗』，第374页

62) 杜海东，『热带三友·朦胧诗』，第7页

63) 刘士杰，「论杜运燮的诗」，『现当代诗歌：中韩学者对话论文集』，北京，2007，第90页

于简单草率，不管在创作上或在感情上皆与事实不符。不管是吴进或杜运燮，他的一生是属于马华的，也是属于中国的，他与马华和中华不断的对话。他的著作中直接表现马来亚主题的有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1993）与散文集『热带风光』（1951）；新加坡出版的『南音集』（1984）与杜运燮去世后出版的『热带三友·朦胧诗』（2006），绝大部分的诗文都与南洋有关。其他诗集，即『诗四十首』（1946）、『杜运燮诗精选一百首』（1995）、『海城路上的求索』（1998）、『杜运燮60年诗选』（2000），都收入不少南洋诗作，可见杜运燮的经历、情感及创作，一生都与中国和马来亚分不开。杜运燮的个案在马华与新华都出现过，比他更早的时期有，例如林文庆、邱菽园及郁达夫，他们也是即属南洋，也属中国；在当代也有，最明显的例子是李永平与张贵兴，他们同样即属台湾，也属马来西亚。我们或许可借用梁元生的词汇，把这些人称为“之间人”⁶⁴⁾；或者也可借用王润华的说法，把这些人归类为越界跨国的写作群，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在两国、两地、两个时空、两个语境中不断地对话与辩证。

64) 钟怡雯：「杜运燮与吴进——一个跨国文学史的案例」，“第二届亚洲华人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马来亚大学，2011年11月5-6日

65) 梁元生，『边缘与之间』，上海，复旦大学，2010

参考文献

- 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新加坡,万里书局,1978
- 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 ,『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选』,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 、张同道编选,『西南联大现代诗钞』,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
- ,『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怡保,霹雳文艺研究会,1993
- 蓝隶之,『九叶诗派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 梁元生,『边缘与之间』,上海,复旦大学,2010
- 刘士杰,「论杜运燮的诗」,『现当代诗歌:中韩学者对话论文集』,北京,2007
- 孟沙,「一颗不老的诗心」,『流金记事』,怡保,民生报出版社,1997
- 穆旦、杜运燮等,『九叶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 『清流』,2002年01号(总第53期)
- 『清流』,2002年02号(总第54期)
- 『世界文学』双月刊,1989年第6期
- 唐湜,「杜运燮论」,『诗探索』(理论卷),1998年第3期
- 驼铃,『寂寞行者』,吉隆坡,马来西亚燧火出版社,2006
- 许文荣,『搭建中国与南洋的文学桥梁——论杜运燮创作中的双重经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28日至30,北京师范大学会议论文
- 许文荣,「杜运燮诗歌中“情感”与“形式”的动态关系——以南洋诗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为个案分析」,『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 余峥,「智性透彻于生命—诗人杜运燮论」,『理论学习月刊』,1995年第7期
- 赵戒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1)』,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
- 钟怡雯:「杜运燮与吴进——一个跨国文学史的案例」,“第二届亚洲华人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马来亚大学,2011年11月5-6日

<Abstract>

Poetic Thinking Cross-Border

: Du Yunxie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Xu, Wenrong

Du Yunxie(1918-2002) despite is a main representative of Jiu Ye Poetic Group in China,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affiliated closely with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y. Some regard him as the China writer who used to come and stay in Southeast Asia; Some even dividing him to two stages which saying that Wu Jin belongs to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while Du Yunxie belongs to China's poet. All these studie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fact. This paper is means to manifest Du as a real historical figure and to conclude his achievement in literary arena which begin with a few important era of Du Yunxie's life, then combine various interviews, field works and literary research methods and employs plenty of primary resources for the purpose. The peripheral character of Du and his constantly wavering emotions, literary writing is a way out for him to transcend the restriction of reality. His cross bordering experience in today globalization context has been more and more common,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Malaysian writers who sojourn in Taiwan. However the case of Du is still unique. As an oversea Chinese, he has made important achievement in China poetry territory, but emotionally he still attached to his born place. Oversea Chinese identity has been given trouble to him, but this experience made his writing style different from other China's poets. As an important poet, he is worth to be further study. His creative work and life experience would certainly inspire many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 : Du Yunxie, Center, Periphery, Poetry, Prose, China, Malaysian Chinese

투 고 일 : 2012. 1. 10. / 심 사 일 : 2012. 1. 20. ~ 2012.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2. 2. 17.